

温州炒房团 转投实业的启示

温州资本成了投机炒作的最大受益者,却也是这个泡沫破灭的最大受害者。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温州、杭州、宁波、金华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16.4%、8.8%、6.6%和7.6%,跌幅居全国70个大中城市前四位。“过去想的只是投机,现在也要慢慢学会经营实业了。”谈及过去几年的起起伏伏,温州炒房客刘云(化名)近日向记者如是感慨。(11月5日《第一财经日报》)

温州是国内各类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他们利用改革开放的机会,淘得了第一桶金。然而,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温州人,许多年来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个“炒”字:温州炒房团所向披靡;温州炒煤团声名显赫;温州炒作农产品团让人瞠目结舌。温州资本偏好于“投机炒作”是多年来海内外资本在中国市场的一个缩影。多年来,不少国内资本和海外资本首要目的是进入各类市场进行投机,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是其首选地。由于炒作投机成性,即使在其他领域没有投机炒作机会,资本也会创造机会大肆炒作。比如,大蒜等农副产品也被操控成炒作投机的对象。

温州炒作投机成性,使得许多人不愿意踏踏实实做实业,而是整天想着一夜暴富。这使得房地产炒作愈演愈烈,股市几乎成为疯狂囤钱敛财的场所。更严重的是,资本、人才和信贷等资源都弃实业而去,投入到投机炒作领域,使得实体经济空心化,泡沫泛起,风险凸显。

这也需要从经济产业制度上进行反思。导致资本偏爱投机炒作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政策导向出现了偏差。从经济政策上看,不但对实体经济引导和支持不够,而且各种税费等都集中向实体经济揩油。同时,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强调虚拟经济的作用,放任股市、楼市以及各类市场的投资炒作行为。

温州炒客们转投实业给我们的启示非常大。实业兴则经济兴,兴实业必须要有一个有利于实业发展的政策支撑和良好环境,特别是要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炒作行业的利润分配关系。必须挤干经济泡沫包括资本和资产价格虚高现象,必须压缩虚拟经济、容易投机炒作行业的利润空间,让位给实体经济。资本与生俱来的天性是哪个地方利润高、哪个行业利润大就追到哪里、流向哪里。只要实体经济获利空间和获利机会大于虚拟经济,容易投机炒作领域,资本就自然而然地向实业流去。人才、信贷资金等资源都会随着资本而流向实体经济。

热钱来袭 怎么看? 怎么办?

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相继推出各种货币宽松政策之后,全球流动性再次泛滥,大量热钱涌进香港,促使香港股市创出15个月新高,也使香港楼价飞涨,香港金管局5天内4次出手稳定港元汇率,累计买入18.5亿美元,这显示了香港捍卫联系汇率制度的决心。

香港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热钱来袭,除了看中香港的楼市和股市之外,恐怕也是想借此“宝地”觐观中国内地,押注中国经济见底回升及人民币升值。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对美元出现了持续的升值,屡创新高。需要警惕的是,全球流动性再次泛滥形成的这股国际热钱是否会通过各种渠道涌入内地市场,从而对好不容易通过经济调控成果产生负面影响。

伴随着亚洲经济的复苏以及外部流动性的泛滥,明年通胀或将卷土重来,这将是该地区面临的首要问题。对于中国内地来说,目前,由于政府对资本流入设定限制,热钱流入驱动的物价上涨影响将很有限。但未来如果中国经济数据持续向好,增长稳定并且人民币升值坚挺,中国所面临的资金流入压力及输入性通胀将会继续增大。如何应对热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首先,目前中国实体经济的“滞胀”特征明显,在此背景下,外部流动性泛滥导致的输入性通胀“不可控、难调节”将使我国“稳增长、控通胀”等多重政策目标实现难度加大,使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困境。因此,中国经济调控政策要更加及时、审慎、细致,更加具有前瞻性、准确性和灵活性,尽可能使用数量手段对冲流动性,避免本国货币过快升值,要始终对通胀和房地产泡沫采取高压态势,有效防止通胀水平和房地产价格的反弹。

其次,采取有效措施,稳定人民币汇率,尽可能降低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人民币汇率改革仍然要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原则稳步推进,同时要加强对资本流进和流出的监管,严厉打击跨境资金违规流动,防止违法违规短期资本对各种资产的炒作,导致资产泡沫的产生。

第三,香港和内地要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共同防范游资套利。对香港和内地而言,在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控制资产市场的价格将有利于防范游资投机,同时两地金融管理部门要紧密合作,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扩大金融监管合作,共同应对游资投机。

最后,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方面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以减少美元霸权、美元泛滥对中国和世界的经济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需要反思和调整我们的汇率政策:人民币汇率是否还要继续盯住美元?如果美元是一个信用良好的货币,不会泛滥,不会贬值,人民币汇率继续盯住美元也许不至于这么被动,但现在无节制地增发美元,不断地搞量化宽松政策已成为美国政府转嫁危机的常态化手段,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汇率还要继续盯住美元,将被迫不断地购入美元,只能不断地吃亏,不断地被掠夺,不断地被强迫人民币升值。是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

石建勳

幸福社会的根基是“以人为本”

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幸福”成为热点社会话题。

前段时间,央视以“你幸福吗”为主题,采访了很多民众,大众的回答也是千姿百态,引发热议。另据报道,现在,全国有18个省市、100个城市将“幸福社会”列为执政目标。显然,从民众到地方政府热衷于“幸福”,体现了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尽管,大家都在谈幸福,都在追求幸福,但“幸福是什么”这样关键的问题,却人言言殊。有民调显示,则多人认为“涨工资最幸福”,很多人则认为身体健康、婚姻美满最幸福。当然,有专家学者也指出,幸福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体验。

但是,当诸多地方政府将“幸福社会”作为执政目标,并试图制定“幸福指数”的时候,作为公共政策目标的“幸福”,就不仅仅是一种主观体验,也不能单纯与涨工资等具体事项挂钩,“幸福社会”也就不只是“跟着感觉走”了。

如今很多地方已经推出“幸福指数”,其中包括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居民收入、住房等很多可以量化的指标。即便如此,统计部门每年得出的

“幸福指数”都在增加、改善,是否就能说民众生活得很幸福?或者说,幸福指数已经非常可观,是否意味着当地已经进入幸福社会?

显然,“幸福社会”所指的“幸福”,并非简单的心理学概念,也不能单纯地用物质性的指标来衡量。

建设“幸福社会”,将“幸福社会”纳入公共政策范畴,实质上就是在“政治学”的范畴中谈论幸福。现代以来,不乏有以“追求幸福最大化”为目标的功利,而且以计算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于忽视个体的权益,曾经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是,这样的观点并非没有启发。至少,其将幸福作为一个社会追求的目标,也将讨论引向“一个社会何以才能幸福,政府应该做什么才能增进和保障公民的幸福”。

我们或许会经常面临这样的“幸福悖论”。比如,一个城市要开发房地产,这能够带动城市经济的增长以及相关人员的收入,但是,一个房地产项目可能会遇到“钉子户”而受阻,那么,是否说,这位钉子户的幸福就可以牺牲,以增进其他人的幸福?显然,这样做可能会带来整个城

市“幸福指数”的增加,但是这样做又违背法律和社会共识。

因而,建设“幸福社会”应该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至少应该致力于保障每一个人追求幸福的同时,也要维护社会公正,以避免伤害他人追求幸福的权利。

政府无法满足社会成员千差万别的幸福偏好,也不使用量化工具考核民众幸福感的多寡。建设“幸福社会”,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回到社会公平与公正,回到公民的基本权利本身——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进步需要“将人作为目的”,一切公共政策理当把“以人为本”作为根基。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的,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幸福社会”并不神秘。虽然,很多公众和地方政府对“幸福社会”的理解,还在“跟着感觉走”,但是,只要尊重公民权利、维护好社会公正,“幸福社会”并非遥不可及。人们对于“幸福社会”美好的关注、期许,既着眼未来,更立足当下。

京文

归属感

潇湘晨报和大湘网的联合调查显示,超5成流动人口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晋升空间,六成受访者有困难不愿意求助政府管理部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奎认为,流入者要解除心理障碍,政府管理层要消除本位主义,才有可能解决上述两个问题。

夏学奎认为,绝大部分流动人口是从经济社会稍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入,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流动人口存在“打工心态”“过客心态”,觉得自己的“根”不在供职地,对流入地社会没有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始终保持对流入地社会的“陌生人”感觉。

夏学奎分析称,从利益群体的角度来看,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本地户籍人口实质上是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两个群体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力量决定了地方政府对其服务的程度和质量。流动人口因其分散性和组织化程度低,缺乏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其利益要求往往得不到流入地政府的重视。焦海洋/图



15万年薪为何挡不住公考的诱惑

太原男子孙远,国内名牌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工作短短几年年薪达到15万元,可谓青年才俊。但就这么个前途大好的年轻人,却放弃高薪,参加了今年的公务员考。他称:“毕业的时候,看不起那帮考公务员的同学,但是这么多年在社会打拼,让我明白稳定而且长期有保障的生活,才是我需要的。”(11月4日《山西晚报》)

理想再高远再美好,终究抗不过现实安稳的诱惑。孙远的选择,为这个时代的理想和青春留下了一个鲜明的注脚。从每年公务员考试火爆的场面来看,这样的选择并非纯粹的个体选择,而是时势潮流。心怀理想,也许很多年轻人曾看不起这种被体制“包养”的生活。从现代政治伦理而言,公务员的岗位,作为公共服务者,是无趣而枯燥的,体制的壁垒内太多的繁文缛节,束缚了他们理想和志趣实现的自由空间。但这终究是理论,在公务员群体成为最大既得利益群体的现实环境

下,端上一个“铁饭碗”,或许才是成功的标志。

无论以何种方式奋斗,最初的理想都是衣食无忧、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但在当前的福利和保障环境下,这些起码的理想,已成为年轻人难以承载的重量。唯一能帮助他们摆脱这种困窘的,似乎只剩那些“铁饭碗”了。端上这铁饭碗,意味着你就能享受社会福利保障的最惠待遇,意味着你只要成功通过一场考试,就能赢得其他人疲于奔命想要收获的人生。这,恐怕正是15万年薪和美好职业前景都抵不住公考诱惑的原因。

心安是福,但对于太多颠沛流离的年轻人而言,动荡的命运和生活并不能以丰厚的财富和职业的光荣来平息。为什么富二代宁愿选择去考公务员?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有钱不如有权?为什么3000多大学生要去争抢事业编制的清洁工岗位?所有这些选择,理由都是公务员才有安宁。也许,基层公务员的收入并不高,但生活各方面都有优先保障。他们不用担心在残酷的职场竞争中被淘汰流落街头,最不济还能在底层混

日子;他们不用担心过劳死,大多数人都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而这些,都是那些在奋斗路上的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但只要是公务员,却能够轻松实现。

公考的诱惑,是现实的压力与体制的好处共同作用所形成的。体制内外的反差,实际上已经帮助年轻人做好了选择,任何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在强大的生存压力面前,也许都变成了可笑自尊和骄傲。某种意义上,年轻人已经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

不是年轻人太现实,而是他们生活的环境太残酷。残酷到让他们在理想与现实面前,用不着你去选择都能够判定所走的道路是对是错。幸福是什么?就是人能够从生计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不要成为生活的奴隶,尽可能去成为理想的主人。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又有多少人为了当初那一瞥“看不起”而不苟且?前途尚好的孙远选择了苟且以顺从潮流,对于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对于那些依旧在底层苦苦挣扎的年轻人来说,又怎能挡得住这片“福利后花园”的诱惑? 时言平

官民合作解决难题,中国必由之路

十八大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大会,它对中国下一步的战略成功有着难以估量的意义。中国社会各界都对十八大抱有很大期望,甚至一些人希望通过这样一次大会就能自上而下解决所有问题。然而这样的期待也未必实现。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代的中国,一个关键性的政策调整就能带来全社会的转折性突破。

中国已是全球最有力量经济体之一,谁都能看到中国国家力量的强大,但中国民间力量成长的速度同样很快,民间对国家决策的影响能力增加尤其快,今后中国解决各种复杂问题,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官方和民间各种力量能否有效合作。

政府的动员力和执行力总体看都面临新环境。社会思想多元、舆论监督都对政府的能力形成一定限制。中国官方已不可能再像30年前那样“万能”,而社会对政府

的态度是矛盾的,既希望它向“小政府”过渡,又希望它对各种难题“大包大揽”。

中国的问题绝大多数不再是革命时代的敌我矛盾,而成了人内部的利益关系,这比敌对关系要复杂得多,快刀斩乱麻几乎无法做到。由于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多元化已成现实,问题只能一个扣一个扣地细解,那种“胜者全有,败者全无”的简单逻辑已不适用。

社会主义的优势之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新形势下保持并发挥这个优势,必须同时追求民主和公平,兼顾各方利益,而这个原则落实到实践中,意味着一方面激活大量矛盾,一方面要把它们一一摆平。

中国社会不仅多元化明显,而且舆论对扩大多元热情很高,对维护共识和共同利益则抱有一定警惕。很多人认为鼓励反对是必要的,舆论对抵制拆迁以及反对工程项目

的支持常常是不需甄别的。

所有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中国下一步解决难题,需要当局和社会力量的合作。创造官民合作的气氛和机制,对于国家继续前进都至关重要。

官方和民间都首先要了解政府能力实际在下降的事实。官方要清楚自己已能决定一切的想法已不合时宜,不受监督做事的环境更不可能重现。官方需要有更多依靠民间力量解决问题的战略思考和政策安排,逐步实现大政府和大会的平衡统一。

政府有了这个愿望,民间对解决问题的态度也一定会逐渐变化。民间会最终搞明白,中国今天的问题靠政府已经解决不了,也不该仅由政府解决,那样的话已经很大的政府只会越来越大。全社会必须形成解决问题的合作系统,而非围绕各种问题的对立格局。中国下一步能不能走好,执政党

江苏扬大附中中学生徐砺寒估计没有想到,他在放学途中不慎弄坏了他人轿车后视镜后留下那张道歉及赔偿联系的小纸条,会令车主“无比感动”和“极度震惊”,并引来一连串感人的后续:被撞车主感动之余主动不徐砺寒赔偿;一家修车行表态愿意免费为受损车主修车;网友们纷纷感慨,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美好……

细看大家对此事的感叹,如出一辙,都觉得男孩的诚信弥足珍贵。现实中我们时常面对的窘境,是互信的缺失,是对陌生人留个心眼儿,是对各种商品、各种服务的疑虑重重,是可能的肇事逃离和得理不让人,更有似乎随处可见、一触即发的争执和吵闹。我们无奈地要成为各种“专家”:要学会验证阳澄湖大闸蟹的“金毛银爪白肚皮”,得掰开月饼学会辨认馅子是否隔年,去修车必须认明修车铺子会不会以次充好……

缺乏诚信,人们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成本,才能维护商业信用、保证正常运转。我们会为了一点小事,跑遍许多部门,展示诸多证件,填写无数表格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更不消说,我们还在为诚信缺乏付出的高昂精神代价,要为修复国家形象做更加艰苦的努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中学生的赤子之心便更显得珍贵。

在经济急剧增长、城市不断扩张中,曾经倚仗熟人社会道德压力来规制行人的文化传统正遭受挑战,诚信危机在不断提升国人的承受极限,也弥漫到我们身边的所有领域:从学术腐败到食品安全,从能不能扶摔倒的老人到小学生的家庭作业是否家长代劳……在情感约束越来越少的“陌生人社会”里重建道德规范,虽然艰难但势在必行。徐砺寒的诚信举止,更大的意义是我们看到了希望,下一代正在告诉我们,“诚信”二字有重塑的可能。

一些城市,比如上海,已经把“诚信”二字,郑重写入城市新的价值取向。确实,诚信不光关乎道德,也关乎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竞争能力。西方学者福山在《信任》一书中说:“一个国家的福利及其他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遍的文化特性,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

事实上,我们已经历过诚信之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郑重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国务院也早就大力推进“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然而,托举向善的力量,我们不能全都往“社会”上一推了之,这是每一个公民必须面对的考题——碰到需要负责的事儿,我们能否像中学生小徐一样,恪守诚信,勇于担当? 李泓冰

近几年来,央企因为“稳定、高福利、发展空间大”,已经成为大学生眼中最热门的工作单位选择,可是,得到一些央企工作的过程却总是让人感到云里雾里,不甚透明。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调查显示,79.4%的受访者认为央企招聘不透明。在调查中,“家人、熟人推荐”被认为是进入央企最关键的因素,占71.6%;有88.6%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规范央企招聘行为,应该像公务员招聘一样公开公正”。(11月5日《中国青年报》)

央企虽然不是政府公务系统,却在享受着国家拨款以及各种优惠政策,作为“共和国长子”,显然不能仅仅将其归结为“企业系统”,而忽视了其自身正在享受的公共资源和行业优越性。因此,央企的人员招聘,显然就不应是简单的“企业内部的事务”,而具有毋庸置疑的公共性,公平、公正、透明以及公开竞争仍然是最起码的招聘底线和规则。因此,必须用“陌生人社会”进行拯救。

美国著名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这样阐述“陌生人社会”:“现代社会有一个较简单社会中几乎完全没有的特征——依赖陌生人。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也就是说,一个理性、成熟的社会,就应该是“陌生人社会”,虽然素不相识,但凭借无所不在的秩序感和规则意识,以及对法律的无限敬仰、敬畏,每个人都是井然有序的“社会齿轮”,在自然正常地运转,他们不徇私情,杜绝腐败,信仰公平,坚守法律,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灵魂宁静、精神和谐。

因此,央企也应该加强“陌生人社会”的构建,让固化的人才招聘重新“活”起来,“动”起来。成为敬畏规则意识、坚守法律信仰、敬畏契约意识、倡导社会公平的积极推动者。特别要将公正和透明招聘制度的建设放在首位,任何招聘事宜,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都应该让群众充分知情。因为只有充分知情和透明了,更多“逆淘汰”、“职业世袭”才能受到无情的围观并得以纠正。要让“陌生人社会”的规则落到实处,为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带来活力和发展动能。耿银平

诚信男孩「震惊」了什么

央企招聘应有「陌生人社会」意识